

四年一度的美國大選已漸入高潮,與往屆大選相比,本屆大選有幾大看點。

一、從政添“原罪”、非主流派異軍突起、兩黨分別左轉右轉。在本屆大選中,那些擁有完整從政資歷、為政循規蹈矩的主流派政客不再受到選民的青睞,部分選民也不認同由政治大家族輪流把持總統大位。杰布·布希已于第三站初選失利後退出競選,喜萊莉的競選之路也磕磕碰碰,受到黨內名不見經傳者的有力挑戰。共和黨方面,兩位非主流派——極右翼的政治素人、億萬富翁特朗普和右翼民粹主義“茶黨”人、德克薩斯州聯邦參議員克魯茲最受歡迎。最新的民調顯示:他們兩人共瓜分了共和黨62%的支持率。民主黨方面,在黨內初選的第一站,大熱門喜萊莉僅以4票之差49.8%的得票率險勝桑德斯49.6%的得票率,其後桑德斯贏了第二站,第三站兩人的得票率為喜萊莉的52%對桑德斯的48%。桑德斯是位游離於兩黨之外非主流派的民主社會主義者,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位信仰社會主義的聯邦參議員。兩黨四站的初選結果不難看出:共和黨右翼的特朗普和克魯茲雙領風騷,共和黨或將加速右轉;喜萊莉遭到左翼桑德斯的強有力挑戰,民主黨或將進一步左轉。將來不論誰入主白宮,都將在兩黨分道揚鑣、政爭更加激烈的濃重陰影下執政。

二、兩黨各有軟肋、短板。美國政治的潛規則:當某黨總統任滿最多兩屆任期時,選民“換個黨做做看”的心態很強烈(羅斯福例外)。在整個20世紀內,只有杜魯門和老布希能藉助同黨前任羅斯福和里根的巨大威望和政績成功當選總統,但杜魯門和老布希都只當過一屆經大選產生的總統(杜魯門的第一任期是接任)。奧巴馬是靠“改變”的旗號上台的,如今他兩屆任滿,美國沒有多少改變,只是改變了總統的膚色、改變了奧巴馬自己而已。故雖然喜萊莉在目前舉行初選的各州大幅領先,但她成爲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與成爲美國歷史上的首位女總統,依然是兩碼事。

不過,面對民主黨的軟肋,共和黨卻也笑不出來,因爲共和黨自己也有兩大短板:一是黨內選民中瀰漫着強烈的反體制情緒,特朗普的口無遮攔成了這些選民發泄不滿的最好出氣筒。雖然特朗普據此得以一飛沖天,但共和黨選民的最愛卻未必是全美國選民的最愛;二是黨內群雄並起,沒有如里根般能登高一呼統領全黨的雄主,非傳統非主流的特朗普和克魯茲乘勢而起。兩人一樣反權威、一樣粗魯、一樣厚臉皮、一樣爲達目的不擇手段,被媒體以大字標題嘲諷爲:《共和黨:兩個“瘋子”戰爭》,“瘋子”能帶領美

本屆美國大選的幾大看點

周晉

國走向“迦南美地”嗎?隨着特朗普在3月份舉行初選的各州大幅領先,共和黨內開始認真討論的不是大力支持特朗普,而是特朗普若出線將引發的“共和黨的泰坦尼克危機”。難以獲得共和黨鼎力支持的特朗普能笑到最後嗎?

三、曇花一現的第三勢力
3月7日,前紐約市長、全球性財經媒體“彭博社”的創辦人、億萬富翁彭博正式宣佈不參加本屆總統大選的角逐,斷掉了許多人士的念想。彭博有意參加總統競選時,特朗普曾稱彭博參選後兩人就不再是朋友,喜萊莉則要彭博不要浪費時間,看來彭博這個可能會半路殺出的程咬金對兩人都有足夠的殺傷力。

原爲溫和共和黨人的彭博身家高達365億美元,他在“9·11事件”不久後擔任紐約市長時,紐約經濟瀕臨崩潰、公共財政遭到重創,紐約人惶恐而沮喪。在其後的短短幾年里,彭博把紐約這個經濟與治安混亂不堪的世界大都會治理得秩序良好,創造了數萬個工作崗位,把60億美元的財政赤字轉化爲數十億美元的財政盈餘。在12年市長任內,彭博只拿象徵性的1美元年薪;他經常乘坐地鐵上下班,卻拿出6.5億美元的私人資金支持紐約的公共開支和市政建設。許多美國人相信“當好美國總統未必能當好紐約市長,但當好紐約市長就一定能當好美國總統”。英國《金融時報》就認爲:彭博是美國總統的最好人選。筆者也認爲:億萬富翁能夠毫無報酬地回饋社會、長期積極地投身於公眾事務,非常難能可貴。彭博有豐富的行政管理經驗、施政穩健,比從未擔任過公職的特朗普和只擔任過美國國務卿、僅熟悉外交事務的喜萊莉都更適合擔任美國總統。美國面臨的問題太多了,美國政治陷入兩黨政爭的白巢里太久了,急需一位有新思維新理念、既不受兩黨黨爭影響

也不被兩黨政策綁架的新總統,彭博無疑是最佳人選。不過,在越來越“仇富”的美國,彭博因爲太有錢且與華爾街關係密切,容易被仇富和對華爾街的貪婪感到不滿甚至仇恨的選民拒絕。更重要的是:彭博沒有強大的

政黨爲奧援,在美國歷史上還從來沒有過一位兩黨之外的獨立參選人能成功當選總統,彭博的總統之路,注定要比政治素人特朗普、少數族裔奧巴馬和女性喜萊莉的總統之路更加艱難。他能及時收手,是明智之舉。連彭博這樣有錢有名有才的人在美國都無法走出兩黨政治的陰影,開闢第三條從政之路,其他人更是毫無機會。美國政治至今無法陸級到歐洲各國普遍存在的多黨聯合執政模式,對美國而言並非好事,因爲多元化政治比二元化政治更適應當今的世界。

假如“網絡紅人”特朗普當上總統會怎樣?



特朗普一贏再贏,目前他手握的代表人票(delegate)位居共和黨候選人首位,超過第二名99票。他當上美國總統的前景,再也不是一個笑話。這位欽羨普京、口口聲聲要讓美國強硬起來不再被看扁的地產大亨,當上總統會是什麼樣子?
(特朗普的代表人票位列共和黨候選人第一位。來源:美聯社)
特朗普的登頂之路攪亂美國政壇

要想象特朗普當總統的樣子,就要先想象他的登頂之路是什麼樣子。

首先,他勝利的腳下,必然是一個撕裂的共和黨。自特朗普的勢頭在3月初明朗,共和黨建制派已經放下此前的遲疑不決,吹響了阻擊他的號角。不僅作爲競爭對手的克魯茲、盧比奧對特朗普火力全開,連2012年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羅姆尼也站出來攤牌,公開發言特朗普是“騙子”,並號召所有共和黨人投克魯茲、盧比奧和卡西奇的票。這是共和黨的緩兵之計——如果沒人能單挑特朗普成功,那么只有靠多人分散選票,阻止特朗普贏得提名所需的絕對多數代表人票;這樣拖到7月的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通過騰挪“非綁定代表”(unbound delegates,即不受預選結果約束、可以自由決定在黨代會上投票給誰的代表)或更多輪的重新洗牌,保薦原本得票不及特朗普的其他人成爲提名人。

3月,羅姆尼公開表示特朗普沒有資格當總統;2012年特朗普曾爲羅姆尼的總統競選背書。來源:CBS)

但共和黨的這一“陽謀”,在特朗普面前是脆弱的。他的殺手鐮就是:宣佈退出共和黨獨立參選。雖然競選初期特朗普就與共和黨全國委員會(RNC)簽下協議,保證尊重共和黨最終的提名決定並不會獨立參選,但特朗普也留了個心眼,加了一句“如果共和黨公平待我的話”。不難想象,黨代會召開之前,特朗普放出口風,影射共和黨“暗箱操作”,表示不排除獨立參選的可能。支持特朗普的廣大選民們也會同仇敵愾,涌向共和黨黨代會召開地,捍衛自己選票的力量。爲了防止出現一個場面失控、貽笑大方的

黨代會,共和黨高層恐怕也只有與特朗普握手言和,拱手送上提名。所以,特朗普登頂共和黨提名人的過程,必然也是共和黨內部政治刀光劍影、建制派精英與反建制派選民矛盾劍拔弩張的過程。特朗普的贏,仍是共和黨的輸。

這種輸,還可能體現在與總統大選同時舉行的參眾兩院改選中。面對特朗普這樣一個民意高度分化的總統候選人,在基層競選打拚的共和黨國會議員候選人們將左右爲難——讚美特朗普,則可能疏遠許多不慣他的選民;批評特朗普,則連帶損害本黨形象。共和黨目前在眾議院的多數席位或許還能保住,但在參議院54比46的微弱優勢則岌岌可危。特別是因爲,最高法院大法官斯卡利亞(Antonin Scalia)2月意外去世後,參議院的共和黨人將百般阻撓奧巴馬總統提名任命自由派大法官,未來很可能上演一出出拖延聽證、無理否決提名人的鬧劇。這就爲民主黨的選舉動員貢獻了口實。

如果特朗普當上總統,也意味着贏得了與民主黨的總統提名人之間的惡戰。這更可能是一場基於人身攻擊、負面宣傳的競選,而非一場比拼政策的較量。可以想象,如果對方是希拉里,特朗普將緊抓不放她浸淫華府政治二十載的建制派身份、接受華爾街捐款、在“郵件門”中遮遮掩掩……這樣的選舉,煽動起一部分人憤怒的同時,也會讓另一部分人更加灰心喪氣。而特朗普即便在最終的大選中勝出,最多也只能是微弱優勢——甚至可能出現2000年小布希總統那樣,得票總數不及對手、只在選舉人票上佔優的極富爭議的情況,從而引發一場可大可小的憲法危機。

罵起來容易做起来難,特朗普掌權後將難有作為

簡而言之,特朗普當上總統的第一天就會發現,他接手的政治體系,遠比自己在競選時咒罵的那個更加支離破碎。如今大權在握了,他能做點什麼呢?



當前的兩岸關係現狀是否可以維持下去?答案恐怕是否定的。是因爲蔡英文、民進黨的執政嗎?不是。如果蔡英文接受九二共識,情況會不一樣嗎?不會。

如果事情只要蔡英文接受九二共識,那就簡單了。可問題的關鍵並不在這里。

如果我們重新審視台灣2014年爆發的太陽花運動,重新去觀察馬英九的兩岸政策,然後再去思考去年在新加坡舉行的“習馬會”的意義,那么其實你可以發現,問題早已經出現,並且也已經給出了答案。
習近平參加兩會時強調中共兩岸政策底線

太陽花運動的爆發,與其說是對大陸體制的反彈,倒不如說是宣告了馬英九兩岸政策的終結。馬英九的兩岸政策最初是有效的。因爲經濟上輝煌的前景掩蓋了兩岸兩種不同政治文明潛藏着的衝突風險,掩蓋了兩種不同價值認同之下,兩岸人民交往可能產生的對立、摩擦與不滿。

但在最初開始的時候,這些並不重要。大陸龐大的市場爲外向型、依賴於外部市場的台灣經濟提供了足夠的市場空間。加之大陸本來就有意藉助於經濟力量打入台灣內部,完成統戰任務。因此,北京與台北之間,一拍即合。台灣民衆在政府的重重許諾之下,看到了新的生活前景,自然不會反對。

可惜現實是另一番光景。幾年下來,台灣普通民衆並沒有分享到大陸的經濟利好政策帶

兩岸議題 蔡英文拿什麼來說服習近平

來的好處。相反,兩岸之間不同意識形態、價值文明出現的摩擦卻越來越頻繁。兩岸關係終於出現了裂痕、出現了情緒上的對立。馬英九的兩岸政策無法彌補這樣的裂痕,無法平復這樣的情緒。

爲何?馬英九在兩岸政策上主張“先易後難,先經後政”。從解決問題的角度思考,無疑是正確的,也是可取的。但問題在於,對於“難”的政治問題,馬英九提供了什麼答案嗎?沒有。對於兩岸交流過程中不斷產生的政治矛盾、價值認同議題上的衝突,馬英九試圖解決了嗎?沒有。

可以說,直到2015年底的“習馬會”之前,兩岸關於政治談判、關於政治對話,沒有任何形迹可循。馬英九沒有想過,甚至害怕去想這一方面的問題。因爲他沒有能力去面對台灣內部可能產生的政治壓力。

因此,馬英九的兩岸政策,實際上只是一條“政經分離”,並且只做經濟,不談政治的路線。試圖迴避政治議題,只尋求通過經濟往來,從而達到維持兩種不同價值文明、不同意識形態不斷碰撞、衝突的關係的穩定,顯然是太過於天真了。

直至去年“習馬會”的出現,才爲兩岸進行政治對話提供了新的可能,解決了兩岸政府進行直接對話、談判所必然涉及到的政府身份定位問題。如果不解決這一問題,任何涉及政治議

題的談判就不可能進行。只能像以前一樣,繼續經濟事務上的談判。但顯然,這一條道路已經走到了盡頭,除非解決政治上遇到的問題,否則空間就到頭了。

而這一方面的努力,主要源於習近平個人的因素。習近平本人具有強烈的歷史責任感,試圖解決當前大陸政制面臨的諸多問題,首先是執政黨自身的問題。在兩岸關係問題上,也有強烈的意願來解決這一歷史遺留問題。

比如,2013年10月,習近平借參加亞太經濟合作會議之便,與當時馬英九的特使蕭萬長見面時便明確表示:“兩岸長期存在政治分歧問題終歸要逐步解決,總不能將這些問題一代一代傳下去。”因而,從這一角度上看,與其說是“習馬會”爲馬英九提供實現歷史定位目標的舞臺,不如說也是習近平展現其在台灣問題上的歷史使命感的機會。



從這一角度上說,其實也就不難理解,爲何在如此的兩會上,儘管習近平說了不少強硬的話語,卻也留下了極富彈性的政治空間:只要“承認‘九二共識’的歷史事實,認同其核心意涵,兩岸雙方

就有了共同政治基礎,就可以保持良性互動”。

我們也就可以理解,爲何相較於江澤民、胡錦濤時期,當前的對台政策更爲靈活、更具彈性,不排除一切可能。因爲只有這樣,兩岸關係才不會出現大的逆轉,才有機會繼續推進。因爲只有這樣,習近平才有可能實現兩岸統一的歷史使命,哪怕不能在其任內完成,也要打下走向統一的政治基礎。

現在,要繼續維持當前的兩岸關係,需要解決的是兩種意識形態,兩種不同的價值認同上存在的巨大的差異。兩岸需要的是一場政治對話,一次關於政治文明、價值認同的對話。過去,經濟議題掩蓋了這兩種不同力量之間的矛盾與張力。現在它已經暴露出來了,已經成了兩岸關係向前的障礙了。如果不解決,兩岸還能向前進嗎,還能有多少空間來進行交流,還能有什麼樣的道路可供選擇?

所以,現在在什麼對習近平、對北京最重要。是九二共識嗎?不是。“九二共識”模糊的政治基礎已經不足以充當兩岸政治談判、對話的基礎了。如果說當下北京對“九二共識”的強調,還有什么特別的價值,那就是讓北京保持某種政治上的正確性、保持其在兩岸關係上的話語主導權,避免在未來兩岸的政治談判、對話時失去地位優勢與話語優勢。

在這種背景之下,蔡英文在5月20日的就職演講中,要拿什麼來說服習近平?答案已經很清楚了。

陳水扁時期的兩岸路線是走不通的,馬英九的兩岸政策也已經失敗了。現在需要第三條路,基於政治談判、基於政治對話的而產生的第三條路。這條道路的政治基礎,不能再像“九二共識”那樣模糊了,兩岸各說各話,然後假裝都在同一頻道上。在這一點上,蔡英文能做什么呢?